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90年前的今天,嘉定发生“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的农民运动——

“五抗”暴动:先烈撒下革命种子

**中国共产党诞生地
传承红色基因**

吕倩雯

沿着嘉定区西大街往西走,穿过一片老住宅区,再跨过胜辛公路的公路桥,就可以看到一座南北走向的单孔石拱桥。这座位于西大街西端的高义桥,原名高僧桥,石阶桥面仅38级,走完整座桥也不过数十秒。但将时间往前翻到1928年,桥西北隅则是嘉定“五抗”斗争革命烈士殉难之处。

今年是嘉定“五抗”暴动90周年。1928年4月,嘉定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嘉定整个西乡地区进行了一场“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为内容的“五抗”暴动斗争。自4月10日开始到6月9日遭反动派镇压结束,历时长达2个月,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开展农运工作

192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委派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沈金生为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廖家初为县团委书记,周慰农为省委特派员,到嘉定开展农运工作。他们到嘉定后就和原来的中共嘉定特支书记毛品章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张吉人、张漱川、陆默深、朱树仁等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动群众,在扩大农



“五抗”斗争革命烈士殉难之处

吕倩雯 摄

民协会的基础上建党、建团、壮大革命力量。到1927年底,发展了30多名党员,400多名农协会会员。后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在方泰镇李家村召开了农民协会骨干会议,成立了领导农民暴动的革命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农运、青年、纠察等部门,具体部署斗争事宜,并确定以“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为暴动口号。

得到初步胜利

1928年春,一年一度的“春荒”又到来了。许多农民只能靠红花草、麦秆等少量粗米填肚子,不少人只能讨饭度日。4月5日晚,嘉定县地下党、团的一些主要骨干周慰农、沈金生等,农协骨干顾裕丰、顾仲仁、赵阿江等聚集在六里桥乡顾家村顾裕丰家开会,商讨如何解决眼前严重的春荒问题。会上介绍了青浦小蒸和松江枫泾地区农民暴动的情况,最后决定抓住当前矛

盾激化的有利时机,发起暴动,进行武装反抗,并部署了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具体准备的有关事项。

4月10日晚,周慰农、沈金生等在沙冈桥赵家祠堂召开群众大会,作了简短的动员,会上群情激愤,要求惩办地主豪绅。接着暴动队伍分南、中两路出发。南路由周慰农、沈金生率领约200人,奔向薛家庙大地主朱铭侯、朱殿臣、朱群同家。中路由陆默深、廖家初、张漱川率领40多人,奔向六里桥乡中窑(钟姚)村大地主朱寿山、朱荣耀家,分了他们两家的粮食和布匹,没收了他们的金银财物,然后放火烧了朱荣耀家的租债账册和三进五十余间房屋。暴动中还决定严惩出卖农民协会会员的国民党六里桥乡乡长傅企周。

第一次暴动,分了5户地主老财的粮食、布匹和衣物,没收了他们的金银财物,烧毁了他们的租债账册和房屋,并镇压了5名地主豪绅及其

走狗,其时群情激奋,一片欢腾。

暴动的初步胜利,大大鼓舞了嘉定西乡的农民。连续六次的暴动中第三次暴动声势最大,参加的人数达800多人。4月12日夜,暴动队员手执火把、梭标等,声势浩大,分三路开赴外冈镇。暴动队伍打开了不法商贾的门,把粮食布匹等物分发给贫民百姓,暴动队伍还冲进了葛隆公安局,收缴了那里的枪支弹药,火烧了公安局。

撒下革命种子

“五抗”暴动,给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劣绅以有力的打击。对此,国民党嘉定县政府惊恐万分,连续成立了“剿共”指挥部,到处张贴通缉令,重金悬赏缉拿领导、组织暴动的15名共产党员,并且动用白崇禧一个营和全县警察下乡“围剿”。

由于党处在幼年时期,缺乏斗争经验,加之敌我力量悬殊,暴动

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在这场暴动中先后有100多人被捕,14名共产党员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5名同志死于嘉定、苏州、上海漕河泾狱中,但这次暴动仍然具有重大意义。通过暴动,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成为广大群众的政治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扩大了;沈金生、周慰农等县委领导在暴动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敌人的淫威面前正辞严、坚贞不屈;在敌人的刑场上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献身精神和英雄气概是永远值得我们缅怀的。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但也显示了嘉定农民在党领导下迸发出的巨大革命热情,在嘉定的革命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他们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他们洒出了身上的热血。

今天,嘉定与全国各地一起步入了新时代。革命的种子已经开出鲜花结了果,烈士的鲜血铺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

专家
点评

上海农村革命斗争 历史值得发掘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党初创时期,在城市中心的指导思想下,曾经发动领导了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城市革命运动。历史的浓墨重彩,大都集中在这一方面。而上海郊县的农村革命斗争历史却有所忽视。人们知道最多的,可能就是陈云同志领导的青浦小蒸农民武装起义,其他地区的农民运动大都研究不多,着墨稀少,宣传寥寥。

新民晚报借助“红色基因”栏目,着力发掘类似嘉定地区农民武装起义的革命历史,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这是很有意义的,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陶柏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新时代 奋斗者

环山苍翠,流水潺潺,在西藏亚东河谷边的鱼池里,产完卵的上万条鲑鱼静静游弋着;而在陕西省延安市的黄土坡上,来自上海的“蟹宝宝”们在陕北小县城落了户。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海洋大学多个团队来到我国西部,指导当地居民依靠水产养殖脱贫致富。

青山绿水鲑鱼肥

去年10月,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正式退出了贫困县的行列,上海海洋大学王成辉团队领衔的“亚东鲑鱼产业基地”功不可没。2015年4月,受亚东县之邀,上海海洋大学派出专家团队,助其突破亚东鲑的规模化人工繁育及养殖技术瓶颈,王成辉榜上有名。“当时有两个担忧,首先是对这种高原冷水鱼不熟悉;其次是怕高原反应。”王成辉告诉记者。

与常见冷水鱼显著不同,亚东鲑发情期短,一年仅有7至10天;怀卵量少,一条2000克重的母鱼,平均仅有3800粒左右的卵子,而常见鱼类的怀卵量有100万粒左右。另外,亚东鲑孵化期长,一般冷水鱼的孵化期不超过一个月,而亚东鲑的孵化期却长达110天,是一



王成辉在挑选鱼卵 上海海洋大学供图

般冷水鱼的三倍。亚东鲑鱼卵出膜以后,还要等上30天后才能游动。这对人工繁育提出了高要求。

经验是靠摸索一点点得来的。从初到亚东对鲑鱼不甚了解,到今年能精确推测鲑鱼的“预产期”,每一处进步都凝聚着王成辉团队无数次的实践探索。受精成功率达90%以上,每条鱼种能产卵约1万粒,孵化成活率约60%……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从2015年4月26日第一次前往亚东至今,王成辉已经往返上海西藏两地间18次。“一有问题就得去现场看,以前没有直达日喀则的飞机,得坐两天的火车,再换乘5个小时的大巴,交通很不便捷。”王成辉告诉记者。最难熬的莫过去年春节,当时技术难关还未取得真正突破,技术人员也没到位,王成辉只能和其他教授、研究生一起上阵挤鱼卵,“手掌冻得成猪肝色!一天下

来,肩膀几乎抬不起来。”

在没有养殖亚东鲑鱼之前,当地人都以打工或上山采药为经济来源,现在有了鲑鱼养殖合作社,都有了固定收入,生活有了保障。

到2019年,亚东鲑鱼产业基地预计可以出产亚东鲑鱼168吨,可实现产值逾5000万元。一年的纯利润可以达到100万元,合作社的老百姓每户可以分到1至2万元的红利。

黄土高坡蟹宝壮

在引进大闸蟹之前,陕西省延安市黄龙县的百姓靠种植玉米、养鸡鸭为生,不仅致富无门,连脱贫也是老大难。2013年,上海海洋大学的教授正在研究把大闸蟹引入内陆的课题,恰巧遇上积极寻求旅游突破发展的黄龙县县委书记任高飞,双方一拍即合。当年,经过专家教授的实地考察,黄龙依靠水源丰富、气候适宜成为了“蟹宝宝”的新家。

“蟹宝宝”刚来黄龙,“监护人”的落实便是第一个难题。以前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既对养蟹充满了好奇,又不敢接这个“烫手山芋”。但随着当地政府投资完善配套设施,提供饲料,联系上海海洋大学教授前来指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心动。2014年中秋节前,大闸蟹试养喜获成功。黄龙百姓这下安了心,不少人成了大闸蟹养殖户。

“我们在黄龙指导养殖的大闸蟹,品质好。它的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较高,增加了它的可食性,味道更甘甜。”上海海洋大学教授成永旭告诉记者。如今的黄龙县大闸蟹,已远近闻名,个个青壳白肚,黄毛金爪,个大肉鲜。陕北高原上的人们,不仅吃上了自家门口的大闸蟹,还借着大闸蟹一举脱贫。据成永旭介绍,为了更好地推动大闸蟹的发展,黄龙大闸蟹已经注册了品牌,还凭借养殖大闸蟹走上了一条特色养殖促旅游、特色养殖助力脱贫的道路。“大闸蟹在陕西很受欢迎,在我们指导下的养殖户,每亩纯收入5000元还是很轻松的。”

见习记者 郜阳

鲑鱼畅游亚东河 蟹宝落户黄土坡

上海海洋大学输出科研力量助力西部产业脱贫